

試論我国生药學改称药材學的意义

赵 守 訓

南京药学院药材学教研组

我国古时的药物书籍多以“本草”为名，历代有不少重要的本草问世，例如神农本草经、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证类本草、本草纲目等，不仅是国内著名的医药典籍，也是世界各国知名的重要药物著作。至清代，虽然没有超过象本草纲目这样的书籍，但为数仍然很多。可是在民国期间，本草系统的新著作，为数却甚少。而在药学教育中，另出现了“生药学”这一学科。解放后，人民医药卫生事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医药教育中产生了以“中药学”命名的学科。同时，有一些药学院校，将生药学改变为药材学。在我国医药界中，原已发生对生药名称有不同的理解，今又出现了生药学与药材学名称和内容的认识问题，为有利于实际工作需要和促进这一学科的发展，实有将此等名称加以讨论明确的必要。生药学原为日本学者首先应用的名称，传到我国也有半个世纪的历史。我国生药学到药材学的演变，这是中、日两国社会性质及医药事业的发展有所不同的结果。今试从生药学的历史及其发展的情况，来论证药材学更符合于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需要。兹将所搜集的有关资料及初步见解论述于后，以供药学工作者的参考，并热诚地希望多给批评指正。

一、生药与生药学名称的来源及其含义

1. 我国古代所用“生药”一词与今日生药学中所指生药二字，其来源不同，含义也有区别。

我国自古对医疗和预防疾病的物质称为药、药物、药材或药品，这是古今医药书籍中很习见的名称，但有时偶而有应用生药一词者，其来源和意义与今日生药学中所指生药二字是否相同，是本文首先应弄清楚的问题。

明史职官志所记载的太医院官职中有“生药库惠民药局各大使一人副使一人”；对其职务记述有“凡天下解纳药材，俱貯本院生药库，以御医一员与大使一员，辨验收放”；“凡太医院所用药餌，均由南京礼部收到各地解来生药制造”。又如清史稿职官志中载有“凡药材出入隶礼部，十六年（1659年）改归本院（太医院），十八年生药库复隶礼部”；“凡遇内药房取用药材，由本院申呈礼部转咨户部，于库内查取，如有缺少给价采买，俱以生药材交进，由内药房医生切造炮制”；“药料鲜竹，均归户部办理，题定每年归河南解鲜竹三百株，由本部札付太医院，烧取竹瀝”〔1〕。这些内容，可以说明我国明、清两代以应用药材名称较为普遍，药料是指制药的原料（如鲜竹），不一定是药材，而生药则是原料药材，即生药

材。乐松生在“北京同仁堂的回顧与展望”一文中提到：“清慈禧当政后，认为同仁堂的藥好，曾令代制宮內服用的成藥。在此以前同仁堂只交进生藥”〔2〕。这就更加清楚我国古今偶而应用生藥一詞，是指生藥材而言；是为了和加工藥材或成藥加以区分。

近代我国出现的生藥學及其所指生藥一詞，可以肯定的說是来自日本。日本在1890年已有生藥學著作出版〔3〕。所用生藥二字与汉字相同，如萩庭丈寿、三桥博曾記述生藥即キダスリ，原写为“木藥”，是制熟前的藥，明治前作治疗应用的藥品完全为天然产物，那时生藥指全部分的藥物。他指出把キダスリ讀作生藥（ソウヤク），Pharmacognosy給以生藥學名称，这都是使用成为现代意义名称的开始〔4〕。这里說明了“生藥”在日本原写为木藥，是指生的天然藥，但自从将Pharmacognosy譯为生藥學，生藥二字才代表了譯自Pharmacognosy中所記載的藥材。

我国较早将外来的生藥二字，引入正式書籍的为中華藥典。該書內容主要是参考日本及歐美藥典編纂的，在其凡例中記有“生藥之原植物或原动物除习聞者外，均于来源項下記明有學名及所隶之科属，其系本国产者，并記明本国某地方产等字样，以引起国人对国产藥材之兴趣”〔5〕。該書所收載的生藥烏头，即欧烏头（*Aconitum napellus* L.），而对我国产量大和应用广的烏头及附子則未提及。可知此处应用的生藥二字是外来的，已不同于我国原有的名詞。也說明我国多习用藥材二字。又如民国22年（1933年）在卫生部卫生实验处化学藥物系的工作任务中，也提到“掌理中国藥材及各項生藥之品質、性状、功用及其精制方法之研究……”〔1〕，这就更加清楚，当时大家对藥材和生藥二名詞有明显的不同理解。

又据我国近代各家生藥學者对生藥二字含义的解释，大体可分为二种：一、认为生藥系采自生物体的藥物，兼有生貨原藥之意。例如赵燏黃、徐伯璽的記述：“今日生藥除矿物殆已不用外，亦以植物界所产之生物占大部分，动物界产者次之，采取藥用植物与动物，供藥用之部及其产物，以一定时令采集，經一定手續調制之，干燥之，复规定适当大小便于医药之应用者，此名曰生藥。生字包括二义，即生貨原藥之意，兼含采于生物界之义也”〔6〕。与以上见解大体类同者，还有顧学裘〔7〕、徐国鈞〔8〕〔9〕〔10〕、王殿翔〔11〕。二、认为生藥系藥物属于天然动、植、矿物，采取其一部或全部，經過简单加工的藥材。例如李承祜記述：“一切藥物属于天然的状态或加以简单的人工調制者，謂之生藥。換言之，一般植物界之树皮、草根，动物界之蛇蛻、兽骨以及矿物界之岩石、矿物或化石等，如以之供藥用时，均可名为生藥”〔12〕。与此见解类同者有楼之岑〔13〕。但所有我国已出版的生藥學中，仅楼之岑著作中載有滑石、白陶土等数种矿物藥材，徐国鈞、赵守訓著作的附录中簡表收載了数十种矿物类中藥材〔9〕。楼之岑在討論普通生藥學的内容时，也曾指明是专讲动、植物生藥的〔13〕。如此看来，我国生藥學所研究的藥材，可以說都是生物藥材。但是此等偏于认为生藥是生物藥材的见解，已和我国原有对生藥的解释——认为是生的藥材之含义有了一定的距离。这些见解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主要是受了日本生藥學的影响。

2. 日本學者所用生藥學名詞是譯自西洋作为现代意义的名詞出現的。

日本在应用生藥一詞之前，多用藥材、和漢藥，另有藥种名称（例如草藥商也称为藥种商）。日本的医药自古均附有汉名，致使日本自己的医药也不可考〔14〕。其所用医术、本草和藥品，在明治維新前均自中国传去，故多与我国相同。对藥物也有藥、藥品、藥草、藥材等名称，并将由中国传去而变为日本的藥物叫“和漢藥”〔15〕。如果我們查閱日本的和漢藥

文獻一書(1868—1938),在其目次內容中就會看到有和漢藥、日本的藥材、諸外国的藥材等專欄,而生藥鑑別、生藥成分項目在修治及植物成分專欄下才找得到,且在明治29年(1896年),始出現有以生藥為題名的文章^[16],可見日本明治到昭和初年以應用和漢藥及藥材等名詞較為普遍,而生藥名詞出現的很晚,且亦少用。

日本應用生藥及生藥學名詞亦不過八十余年。據日本學者萩庭丈壽、三橋 博的記述生藥學是大井玄洞當 Pharmacognosy 被介紹到日本時,在1880年首先採用的日本譯名^[4]。我們所見最早的生藥學專著,是下山順一郎編著,在1890年出版的^[3]。木村康一曾謂:“日本的生藥學可以說是自東京帝國大學第一代生藥學教授下山順一郎博士開始”^[14]。下山順一郎在其生藥學正文頁首,將“隱花類植物的生藥”下註明德文“Drogen der Kryptogamen”,這是日本較早記述生藥二字的正式文獻。此後生藥二字在日本才逐漸應用開來。例如日本藥學雜誌1892年各期,只有在某廣告中的學說一欄下有“生藥概論”的內容^[17];并見某新辦藥校廣告中,列有野金太郎講授生藥學及下山順一郎講授生藥學、生藥學實地實習及顯微鏡上檢查法等內容^[18];在1905年第1期中,又出現了一篇以“滿洲”的生藥為題名的文章^[19];到了1912年第1期,才開始辟有生藥學專欄^[20]。這些內容,雖然不足以說明生藥學及生藥的名稱在日本出現時的全貌,但可以肯定其應用歷史至今僅八十余年。

日本學者討論生藥及生藥學來源和含義的專文,多零星的散見于各專著中。木村康一認為從來一般的把生藥讀為キグスソ,即所謂和漢藥,但現今在藥學方面把這個名稱讀成シヤウヤク,索性以西洋生藥為主,和漢藥為輔來解釋^[14]。且木村康一在其生藥學中的生藥及生藥學歷史一章下,立有“D. 中國的本草和漢藥; E. 中國現代的生藥”等標題,也可以說明他對生藥和我國原有的藥(漢藥),有不同的理解。橋本 亮的見解更較明確,他認為在明治時代,把由西洋傳到日本的常用藥作為基礎,其後多少變成日本式的一些藥品,用生藥名稱;在此以前由中國傳去,而改變為日本的一些藥品,稱為和漢藥,他并指明這是西洋起源和東洋起源的分別^[15]。下山順一郎在其生藥學中,將生藥下註以德文“Droge”可能就是為了說明生藥二字的來源及所表達的含義。

日本學者多認為自 Pharmacognosy 介紹到日本給以生藥學的譯名,是作為現代意義學科的開始,木村康一曾說明現代科學發達了以後,就採用了生藥學這個日本名稱^{[4][14]}。并謂:“下山教授時代是日本生藥學的开发時代”。這些說法都反映了,日本學者認為生藥學是日本創用的。

至于日本學者對生藥學的定义及其內容範圍的解釋,大體上有下列各說法:認為生藥學是“研究醫療目的所用天然產物的學問”^{[3][21]};是“研究天然藥物由生產到消費過程的學問”^{[4][21]};是“生藥的商品學”^{[14][15][21]};另藤田路一較詳細地指出生藥學的狹義解釋是研究生物的干燥體或一部分,作為藥用資源生藥的學問;而廣義的解釋為研究生藥的制劑和成分、制法、品質、已知生藥的改良和發現新天然藥物的知識所必要的、基本的學問^[22],又木村康一^[14]及刈米込夫^[21]曾指出生藥也包括礦物類藥材。可是本文所提及的日本生藥學著作,其內容中都未收載礦物類藥材。所以,可以說中、日兩國各家生藥學內容的範圍是一致的。

3. 七十余年來中、日兩國已出版生藥學的內容類似,體系也大致相同。

歐美藥學中出現 Pharmacognosy 這一學科,最早起源于1815年“C. A. Seydler 論文

的題目“Analecta Pharmacognostica”。英文“Pharmacognosy”原来自希腊文 Pharmakon “药”，Gnosis “知識”，其意义为药的知識。这是古代药理学在植物学及化学的輔助下，到19世紀初发展形成的一門独立学科^{[9][14]}。日本到了德川吉宗（1714—1744）时代，奖励荷兰药草的研究，輸入西洋医学，明治維新后，万事崇拜欧洋，并于1884年下令禁汉法医，改行西洋医术^[14]。此为 Pharmacognosy 传入日本并出现生药学的时代背景。下山順一郎依据其老师德人 Flückiger 所著的 Pharmakognosie 为蓝本，并参考了 Marme J. Moeller, Hager 及 Meyer 諸氏著作，編著了日本最早的生药学^[14]。該书主要收載了欧美經过现代科学整理研究的药材，而为当时輸入日本的西洋医学服务，并倡导对世界各国所用药材的研究。日本学者桥本亮在論生药学时曾記述生药是明治时代由西洋传到日本的知識作为基础，其后多少变成日本式的药^[15]。此等資料，說明了日本生药学內容的主体，是西洋来源的药或多少变成日本西医所用的药材。其后日本各家生药学的内容中，虽然不断地增添經过研究的和汉药，但其基本体系并沒有什么改变。

我国第一本生药学，是赵燏黄、徐伯璠于1934年出版的生药学（上册）^[6]。那时的时代背景和日本出现生药学时类似，我国正处在西洋医学逐步輸入并全盘学习欧美資本主义的时期，国民党反动政权中央卫生委员会还議决有消灭中医的提案^[1]。这时我国西医成了受宠的医学派系，赵、徐生药学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这本生药学的凡例中曾指明：“本书各論正文以下山氏之生药学为主体，参酌 Gilg 氏之 Pharmakognosie, Kraemer 氏之 Scientific and Applied Pharmakognosy 等书。并加入著者最近国药之研究数种。各論附录以本草綱目所載之国药为主体，参酌刘米氏，木村（雄）氏著邦产药用植物，中尾氏、木村（康）氏著汉药写真集成，植物研究什誌，其間关于著者之研究心得加入之处甚多。”又云：“正文中专載现今世界各国著名之生药及公认为确有效之国产药材，及可以代替外国产生药，曾經鑑定之品。附录中以采用国产药材为主体”^[6]。这些記載較明确地說明了我国生药学的出现，并不是由我国自己的古代本草演变发展而形成的新学科（当然不能說沒有影响），而主要是 Flückiger、下山体系的学科在我国发展演变而产生的。当然，这門学科在各家学者，如赵燏黄、徐伯璠、叶三多、李承祜、楼之岑、徐国鈞等努力下，已做了不少工作，相繼充实了国内外新的研究成果，在研究自己国家的药材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若就已出版的十册生药学^{[6][23][7][12][8][13][24][9][10][11]}內容看，多半以敘述西医应用的药材为主或仅以西医用药方式研究药材，使人感到都还没有完全脱离外国的体系。如将各家著作中，所收載的我国常用药材如烏头、甘草、大黃等的內容，一一对比其所記載的項目內容，就可看出絕大部分都是一样，且所提到的制剂及效用，也是西医应用的，有的著作中虽然附帶提及我国中医的用法，但极为簡略。自下山生药学問世以来，以生药学三字命名的著作已近二十册，就其所研究的內容和范围来看，可以說已成为一种有一定形式和体系的学科。

二、試証我国生药學改称药材學是生药学內容 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

我国医药学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长期累聚了我国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經驗和理論

知識，其中的确蘊藏着許多寶貴的東西，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歷代都有不少重要的醫藥書籍，來反映我們這方面的成就。可是到了清朝末年和民國期間，我國原有的醫藥學，不但受到買辦資產階級醫藥制度的壓制，還遭到西洋醫藥的排擠，雖然因為廣大人民的需要和堅決反抗而未被煙沒，但並未得到應有的發展，且舍本取洋和忽視祖國醫藥文化遺產的情況非常嚴重。民國初年教育部公布的大學規程，在醫藥學的課程中，已訂出了“生藥學、粉末生藥學”等課。生藥學名稱，早已通用于日本藥學教育中^[18]。當時我國的教育制度，幾乎是全盤抄襲日本和歐美的，生藥學這一學科也不會例外。解放後，中國人民得到了徹底的解放，正在用自己的雙手來改變舊中國的面貌，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社會，藥材學就是這個新時代中教育革命的一項成果。

假如我們回顧一下數十年來這門學科的發展情況，那就能体会到生藥學到藥材學的演變是很自然的事。例如前國立藥學專科學校，雖然創辦較晚（1936年），但其生藥學早年的教學內容，仍然類似外國的“生藥學”一樣。當時學生學習這門課，很難体会到是中國式的課，不但選用的教材是美國教本，就是筆記也全用英文抄寫^[25]。因之，在實質上還談不上是我國的一門學科，只不過是資產階級買辦教育中的一項點綴品。以後生藥學的內容雖有所改進，但是仍然局限於西醫所用的植物和動物類藥材，並以西洋形式進行教學，對祖國醫藥學基本上是採取歧視和虛無主義的觀點。

解放以來，在不斷的教學改革中，我們才逐漸重視自己國家的實際情況，並相繼到醫藥工作現場去學習。1959年夏，我們又進行了南京地區中、西醫院使用中藥材及生藥情況的調查，使我們進一步了解到南京10多個大的中、西醫院全年使用藥材的情況。西醫所用的藥材，如甘草、大黃、洋地黃、顛茄、龍胆等，絕大多數是以酏劑、流浸膏等製劑形式應用，只有少數是用粉劑或片劑藥（計10餘種），另有若干揮發油，樹脂、樹膠及油脂類藥材（計20餘種），共計150餘種。各院西醫應用的中藥材及其制劑比1956年以前，有顯著增加的趨勢，但各院中醫應用藥材的數量更多，且在實際工作中常發生藥材真偽及品質優劣的問題，這對我們生藥學教育工作者來說，有很大的啟示。同時，各西醫院積極開展西醫學習中醫活動，也相繼開設中醫科和中藥房，這種在醫藥界出現的新情況，對高等藥學院校的教育，提出了進一步的要求。

在1958年秋，院領導組織我們到北京、天津、沈陽、上海等地去參觀學習，使大家親自看到祖國的醫藥衛生事業在三面紅旗的光輝照耀下，得到了蓬勃的發展，也体会到黨和人民對我們藥學工作者殷切地希望和要求。依照黨的教育方針和理論聯繫實際的教育原則作比尺來對照，就更覺得我們的教學內容還遠遠不能適應我國偉大的社會主義衛生事業的需要；也進一步發現自己天天接觸的“生藥”及“生藥學”這二個名詞，並未被廣大衛生工作同志所理解，除了少數學過生藥學的同志外，甚至連中藥藥工和醫護人員也不大懂，這才引起我們開始注意生藥學夾歷的考證工作。在院領導親自參加指導下，我們又進行南京市中藥資料的整理^[26]，以充實新教材，深感到依據我院新的教學內容，採用我國的傳統名稱“藥材”定名為“藥材學”才名符其實，也與我國實際情況吻合。這也是由於解放以來，通過各次教學改革，在生藥學的教材內容中，逐年不斷地增加我國習用的藥材，到1957年止，已有中藥材170—180種，占全部藥材的80%，並有常用中藥專章，如此就促進了這種演變。同時在1958年前後，我組全體同志深入實際一致努力，並認真學習南京、杭州、濟南等地區中藥材加工

炮制技術的經驗，並在總結中藥材實際生產、應用和中藥老師傅寶貴鑑別經驗的同時，進行了文獻查考及研究工作，以科學方法綜合整理，編出了新藥材學參考書^[27]^[28]。我國藥科學校很多，有的歷史還較早。在全國解放前，除了革命根據地的藥學教育^[29]外，生藥學的教学情況是類似的。解放後，各藥學院校的生藥教師，對這門內容脫離我國實際情況的學科，都付出了巨大的勞動，都有了內容比較豐富和比較結合我國實際的教材，並不斷地寫出了新的講義或出版了新著作，還有很多藥材方面的科研報告和論文發表。特別是近幾年來，全國各地藥學工作者不斷地做出了有價值的專著；例如各種植物志、藥材志、中藥志及有關藥材資料，相互交流，更促進了這門學科的發展。在這種新形勢的要求下，有不少藥學院校會將生藥學改為藥材學，我們初步知道的就有10余院校之多（如南京中醫學院中藥系、蘭州醫學院藥學系、南昌藥劑學校、天津中藥學校等），這不但說明有較多的藥學工作者，對生藥學在我國發展演變的看法一致，而且從這些學校不謀而同的將此學科正名為藥材學一點看，就顯示着這門學科發展的自然趨勢。同時，也說明一門學科的性質，必須符合於自己國家社會的需要，其內容也必須依據社會發展的要求，向新的方面發展。毛主席在矛盾論中指示我們：“新陳代謝是宇宙間普遍的永遠不可抵抗的規律”。“任何事務的內部都有其新舊兩個方面，形成一系列的曲折的鬥爭。鬥爭的結果，新的方面由小變大，上升為支配的東西，舊的方面則由大變小，變成逐步歸於滅亡的東西”。這應當是指導我們正確分析客觀事物發展的理論依據。就生藥學而言，本來是屬西洋系統，原為傳入日本的西洋醫學服務的新學科，但在傳來我國的數十年過程中，由於中、日兩國社會情況的變化不一樣，而時刻都在劇烈地變化着，若根據我國藥學方面的實際東西，逐漸在我國生藥學的內容中占有絕對優勢的情況來看，我們的生藥學到藥材學的變化，正是反映了客觀事物由量變到質變的發展。既然日本學者能在学习西洋醫學的基礎上，結合日本具體情況倡用日本形式的學科——生藥學，那麼，我們為什麼不應用適合於我國國情和實際需要的學科名稱——藥材學呢！如果我們只想在充實自己的國家的藥材內容後，仍然繼續沿用這樣一門有一定範圍的外來名稱——生藥學來概括我國極為豐富多采，具有民族特色，並且在結合了現代科學猛速發展着的有關藥材知識，那就不僅會有張冠李戴的感覺，還會有對一些我國藥學實際工作中的寶貴知識加以限制的可能。由此論證，應當有理由說：我國藥學教育中的生藥學改稱為藥材學，將是我國社會主義醫藥教育事業中這一學科發展的趨向。

幾年來，我們体会到這個“藥材”名稱，不但是我國古代用過，而且是現在廣大羣眾、廣大藥工同志所喜用的名稱，在所有有關植物及藥物的書籍中，所有報刊、雜誌上以及政府法令、指示，都會發現大家所習用的是“藥材”而不是“生藥”。如果就我國各家生藥學著作仔細學習，也能發現他們也常用藥材二字。例如趙燏黃、徐伯璽在論生藥學定義時謂：“研究藥材上各方面應有之學理、實驗而成一種之獨立科學”^[6]；顧學裘謂：“生藥或稱藥材”^[7]；李承祜謂：“我人研究斯學，一方面固不可忽視國際性藥物之應用，同時對於國產藥材。更應盡力搜研”^[12]；徐國鈞謂：“生藥學的簡明定義，就是應用科學的方法，來研究和利用生物界的藥材，為人類健康服務”^[8]；梭之岑謂：“本草藥材一千多種……我們國家有很多特產的藥材……”^[13]；王殿翔謂：“利用自然界的產物，採用其有效部分，供用於醫療方面者稱為藥材。藥材之屬於天然狀態或加以單簡的人工調制，未經精煉成為制品者，稱為生藥”^[11]。這些內容也有力地說明“藥材”是我國大眾的共同語言。雖然近年

来,有的著作如中药学^[30]、中药志^[31]中,有时也偶而采用了生药这个名词,但如果从全文仔细了解,就会发现此类书籍中,在少数地方配上生药二字,反而会产生对此等名词的运用上有不自然和不统一的感觉。这也是由于大家对生药二字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或者是生药学者在参加编写时偶而写上的。又如现尚在编纂中的中国药典新版初稿中,也曾出现类似的矛盾,有人希望将甘草、大黄等药材各分为二,一个放在生药部分、一个放在中药部分,这当然是不妥当的。至于药材学的名称,近知过去也曾有过,叶三多教授曾谈到,在三十年代初,上海中法药科创办时的教学计划中曾拟用药材学为课名,可能因为当时我国早有学校,如军政部陆军军医学校药科、浙江省立医药专科学校等,已有生药学课,周军声教授还编有讲义(系所见我国最早的生药学讲义)^[32],所以后来仍用生药学。如果我们将一系列的资料联系在一起,就能了解到群众、广大药工及专家们都习用的名词,在五十年代末才出现在医药教育界中,这决不是偶然的事,而是解放后时代起了变化,中医中药和西医西药事业都同样得到突飞猛进的结果。

三、生药学、药材学、中药学是来源和性质上不同的学科

为进一步说明生药学和药材学的性质,此处首先讨论中药学这一学科的历史,然后再谈谈此三学科的性质和关系。

我国古时药物书籍多以本草为名。对于外国来源的药材,有时加“胡”(如胡黄连、胡桃、胡荽子、胡椒、胡芦巴等)、“番”(如番泻叶、番木鳖、番红花等)等字。到了明代才开始有西洋医学的传入,如意大利人利玛窦(1581年来华)的“西国记法”,为第一部传入中国有关西洋医学的书籍^[1]。但当时尚无中、西医药之分。至清朝末年,西方资本主义逐渐发展,并形成侵略势力,向我国不断地输入西洋医药。十九世纪中叶起,外国人在我国开办医院者日多,逐渐有了各种西洋和日本医药书籍的译著,其中有西医略论、西药略释、西药大成、中西医方会通、中药浅说、新本草纲目等书^[1]。可知我国在西洋医药学大量输入后,才出现了西医西药,并将自己原有的医药改称为中医中药或国医国药。辛亥革命以后,更趋向于学习欧美和日本的资本主义制度。药教育中的生药学,最初就是介绍西洋药材知识为主的课程。近百年来由于西洋医药的影响,本草系统中较重要的书籍甚少,中国药学大辞典(陈存仁等,1935)已是较大型的编著。而现代实用中药(叶橘泉,1952)中国药理学(时逸人,1953)都是在解放后完成的,至五十年代末,才出现了我国第一本以“中药学”为名的著作^[30]。清末以来,西医西药一跃而为我国卫生事业中强有力的“宠儿”,被打入“冷宫”的中医中药,只有在解放后才解除了买办资产阶级的束缚,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中药学正是中医中药在党的哺育下,重新结出来的果实。中药学是研究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医疗所用中药的来源、产地、功用、炮制及应用方法等知识的学科^[33]。因之,中药学的出现是我国古代本草的演变和发展。

我国生药学来自日本,日本生药学又来自欧美,虽然都是西洋医学体系的学科,但由于两国社会情况演变不一样,当然其发展也不可能是一致的。日本学者昔日倡用生药学,就是因为这种学科的主要内容来自欧美,而不同于中、日两国的本草或和汉药书籍。那么,中国的生药学当我们自己药学系统的内容,增多到一定数量时,必然也会和日本的生药学不一

樣，而發生性質上的變化。生藥學中研究藥材的近代科學方法，雖然對我國中藥學和藥材學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但生藥學卻不可能代替我國這二門學科。

就藥材學而論，它是研究中、西醫常用藥材的學科，其主要內容是在重視祖國醫藥學並結合現代科學成就的基礎上，來研究藥材的來源、生產、鑑定、成分和應用等理論知識和技術，特別是有關藥材真偽和品質的知識。所以可以說藥材學是既繼承了我國古代本草的重要內容，又吸取了現代中藥學、生藥學以及世界各國類似學科（如 Pharmacognosy * 和 Materia Medica 等）的現代研究方法和成就；是在我國醫藥事業新形勢的影響下演變發展而形成的學科。從內容上來說，藥材學和中藥學不同，它不僅研究常用中藥材，也研究常用西藥材；不僅要繼承祖國醫藥的精華部分，也要吸取世界各國現代的科研成果。從性質上來說，它已不屬於外來體系的學科，而成為符合我國國情的大眾化、民族化又現代科學化的學科。同時，又是具有我國民族特色和反映了我國豐富的天然藥物資源特點的學科。

結 尾 語

二十世紀已進入六十年代了，世界上各種科學都在飛躍地發展着，有關藥材知識亦不會例外。日本明治維新廢除漢方醫後，其和漢藥多用於販賣的成藥或作為民間藥^[34]。後來的情况雖然稍有改變，但以西洋醫學為主的局面，卻沒有多少變化。不過近年來也出現了对生藥及生藥學名稱和含義的熱烈的爭論。例如在1960年的日本生藥學會名古屋大會上，討論有關植物、生藥及局方（日本藥局方）生藥名詞的問題時，下村 孟曾提出了生藥（ミョウセク）名稱可不可改換為天然藥、植物藥、和漢藥、天然形藥物等稱呼的論點。他認為生藥學（日文漢文相同）對藥學界人士是不會感到奇怪的，但一般人往往有不同的理解，有的認為是草藥，有的認為是未熟的、生的藥等，應當另改名義相符的名稱。又在討論生藥學在藥學教育中的地位時，木村雄四郎一再重複地指出，現代日本生藥業界稱和漢藥為生藥類，有比較現實的重要意義，因為“向來生藥學的講授內容是以歐美生藥為主”。他並介紹了日本大學已設有“和漢生藥學”的選課。此外，栗原廣三提出另一種主張，他希望在藥科學的生藥學課中，講授漢方醫學生藥的應用知識，柴田承二和栗原廣三答辯，認為這是藥學實際的要求和學院式理論知識（Academism）的矛盾^[35]。這清楚地說明有些日本學者對生藥及生藥學的名稱和內容，也有強烈的改革要求。我們中國學者，更應當客觀地、全面地來分析研究自己學科中所存在的矛盾，更好地來推動我國藥學的發展。中、日兩國的社會，幾十年來產生了極大的差別，以醫藥衛生事業而論，我國情況大大不同於日本，我們不僅是西醫西藥日益進步，中醫中藥也在迅速發展。而且中、西醫藥取長補短相互促進，更會突飛猛進。這種新局面，是在我國偉大社會主義社會條件下所形成。因之，我們的醫藥教育具有了社會主義的、民族的特點。我們不只要吸取世界上最新科學成就，更重要地是為了解決自己國家的實際問題，發展祖國醫藥文化，為偉大的社會主義社會服務。我們的醫藥教育體系，雖然有中、西二大系統，但決不能說藥學院只管西藥材，而不問中藥材。如果在教學中不講授中醫及民間醫應用的重要的有效藥材，那麼，不僅教學沒有豐富的內容，也無法要求學生了解一定的中

* 註：徐國鈞教授從各國文獻考證 Pharmacognosy 如譯為漢文，也宜稱為藥材學。

药材知识,更难说对祖国医药遗产的继承和发扬。这是完全脱离我国社会实际的一种想法。如果我们由于我国的药材经过现代科学化以后,而试图改变其大众化的传统名称另定名为生药,那么,这不仅会出现学院式教育脱离我国实际的情况;同时,也很难扭转广大人民的正确习惯。又我国医师所用的药,虽然也有中、西二大系统,但中、西医所用的药材,如大黄、甘草等都是同一种物质,只是加工方法和应用方法有些不同,对药材的品质要求却往往是一致的。药材经现代科学化只是对其本身的认识更深刻了,并没有改变药材的本质。所以,也没有必要改称为这个现在大家都很生疏,也不易正确理解的名称——生药。而且我国中医所用药材有不少是进口的(例如番泻叶、番木鳖、丁香、没药、乳香、阿魏、安息香、芦荟等)。另有很多重要的国产药材,早已成为世界性药材(例如大黄、甘草、麻黄、八角茴香等)。同时,这些药材也是早已在各国 Pharmacognosy 及其类似书籍中收载了的;同样也在我国本草和中药书籍中早已收载了的,过去都称之为药材,并没有感到有不妥之处。因之在医药教育中,将中医学所讲的中药材,又在生药学中对同一物质称之为生药是不妥当的。我们不能把医疗用的药材,作为舞台上的演员来看待,对同一种药材只因为多了一点新的描述又改称为生药。而是应当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来明确这一问题。此外,在谈论药材的品质和应用时,也往往需要全面的谈到药材来源、加工炮制、内部构造、成分和用法,如讲乌头附子时,不谈炮制方法及成分性质,就无法讲其品质标准和中、西医应用的特点。所以若按原来生药学的方法进行教学或研究药材,就必然会对中、西医应用的同一药材所应有的完整知识,产生分割片面讨论的弊病。本着药材学的性质,我们就可以将凡是对研究我国中、西医所用药材有益的知识,特别是有关药材真伪和品质方面的知识都加以吸取,不会因其属于中或因其属于西,而附加以各种条件限制。所以说我国的生药学改为药材学不但名符其实,而且也有其重要的实际意义。这样,不但有益于实际工作,更会给应用药材提供了比较丰富的完整的知识,也必然对研究药材、提高药材质量更为有利。当然,目前的药材学虽然和生药学在性质和内容上都有了变化,但仅是一个开始,还需要不断的充实提高,才可以真正名符其实地反映出我国这方面的成就。但我们相信,在党的英明引导下,经过大家共同不懈的努力,一定会对人民保健事业,放射出更灿烂的光芒。

致谢: 承吴学义教授对日本文献给以指教,并见告日本情况,谨此致谢。

参 考 文 献

- [1] 陈邦贤: 中国医学史, 1957年11月, 第230、231、236、274、278、279、329、340、254、309、312、313、314、326页, 商务印书馆新版。
- [2] 乐松生: 北京同仁堂的回顾与展望, 光明日报, 1961年7月17—19日。
- [3] 下山顺一郎等: 生药学, 1943年3月, 第27增补版(1890年6月第一版)第1页。
- [4] 萩庭丈寿、三桥 博: 医药资源, 1952年11月, 第2、1页, 日本共立书店。
- [5] 伪卫生部: 中华药典, 1931年8月, 第1、48页。
- [6] 赵燏黄、徐伯璠: 生药学(上册)1934年4月, 第1页。
- [7] 顾学裘: 生药学, 1947年1月, 第1页, 商务印书馆。
- [8] 徐国钧: 药用植物及生药学, 1954年10月, 第62页, 人民卫生出版社。

- [9] 徐国鈞、赵守訓：生药學，1958年3月，第1頁，人民卫生出版社。
- [10] 徐国鈞、赵守訓：生药學（中等医药学校試用教科书），1958年2月，第1頁，人民卫生出版社。
- [11] 王殿翔：生药學，1959年4月，第1頁，江苏人民出版社。
- [12] 李承祜：生药學，1952年11月第1頁，中国图书仪器公司（1957年7月版第1頁，上海卫生出版社新版）。
- [13] 樓之岑：生药學（上册），1955年1月，第1、6、8、9頁，人民卫生出版社。
- [14] 木村康一：生药學，日本药學大全，第二卷，1939年9月，第46、53、56、1、2、60、55、56頁，日本非凡閣。
- [15] 橋本 亮：药用植物學，日本药學大全，第二卷，1939年4月，第260頁，日本非凡閣。
- [16] “滿洲”医科大学：日本和汉药文献，1940年9月，第1、10頁。
- [17] 日本药學杂志，1892年，119—130期，第88頁附頁2；178頁附頁3；500頁附頁2；616頁附頁4。
- [18] 日本药學杂志，1892年，119—130期，829頁附頁2。
- [19] 平山：“滿洲”的生药，日本药學杂志，1905年，275期，第13頁。
- [20] 日本药學杂志：1912年，359—370期。
- [21] 刘米达夫：最新生药學，1953年4月增补版，第1頁（1949年11月初版），日本广川书店。
- [22] 藤田路一：生药學，1957年1月，第1頁，日本南山堂。
- [23] 叶三多：生药學（下册），1937年7月。
- [24] 山东医学院药科生药教研室：药用植物學及生药學，1956年3月，人民卫生出版社。
- [25] 前国立药學专科学校刘宝光教授講授：生药學筆記，1942—1943年。
- [26] 南京药学院生药學教研組：南京市中藥調查資料，6冊，1958年11月。
- [27] 南京药学院药材學教研組：教育革命的产物——药材學，南京药学院教学工作經驗汇编，第一輯，1959—1960年4月，第41頁。
- [28] 南京药学院药材學教研組：药材學，1960年3月，人民卫生出版社。
- [29] 北京中医学院1957年班：中藥簡史，1960年1月，第135頁，科学技术出版社。
- [30] 南京中医学院：江苏省中医研究所：中藥學，1959年3月，人民卫生出版社。
- [31] 中国医学科学院藥物研究所等：中藥志，第3冊，1961年2月，第457頁，人民卫生出版社。
- [32] 周軍声：生药學讲义，1929—1930年，伪軍政部陸軍軍医学校鉛印。
- [33] 成都中医学院本草教研組：中藥學讲义，1960年10月，人民卫生出版社。
- [34] 刘米达夫：和汉药，日本药學大全，第2卷，1939年9月，第126頁。
- [35] 高橋眞太郎：日本生药學會名古屋大会感想記，药學研究，第33卷，1961年1月号，第61—66頁。